

评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hegemony”的改造^①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武汉 430074)

摘要:葛兰西赋予“hegemony”以特殊的意义,而拉克劳和墨菲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改造。他们把“hegemony”与“articulation”以及“hegemonic universality”联系起来,用差异要素的链接来说明普遍性,并认为这种普遍性是随时可以被颠覆了的普遍性。因此,“hegemony”这种社会主义策略不过是要把差异的人们临时集合起来而抗议社会不平等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主义策略中包括了诸多困难和矛盾。

关键词: hegemony; 葛兰西; 社会主义策略; 拉克劳; 墨菲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2)10-0016-07

在拉克劳和墨菲的思想中,“hegemony”是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一个意义丰富而又复杂的概念。只有弄清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弄清它的思想内涵,我们才能进一步评价它究竟是不是推进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恰当策略。

一、“hegemony”问题产生的理论背景

只要简单地回顾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虽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发生诸多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而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比如俄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却取得成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有许多人分析过这个问题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是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他们都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他们都是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这个问题。从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尚未激化。而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积极地领导工人阶级,或者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而也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没有看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复杂状况,没有看到

工人阶级队伍所出现的分裂状况。在他们那里,“hegemony”这个概念也没有任何地位。

只是到了列宁,“hegemony”这个概念才出现了。在列宁那里,“hegemony”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本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自然的”主体,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发展不够充分,所以它没有能力来进行这个革命。这个革命的历史任务要由无产阶级来承担。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发挥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主动地承担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hegemony)。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虽然列宁提出了“hegemony”这个观念,但在列宁那里,这个观念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决定论思想。按照列宁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社会革命的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身份都是由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在这种决定论中,列宁赋予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党”以政治上特殊的地位。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使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没有真正地达成民主,而是走向了威权统治。或者说,在列宁那里,“hegemony”(领导权)变成了政治统治权。“hegemony”的应有的含义也没有被恰当地表达出来。在他们看来,只有葛兰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葛兰西的“hegemony”理论意蕴

在葛兰西那里,“hegemony”常常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这就使人们在把握这个词的准确意义上发生困难。按照《狱中札记》英文本译者的

^① 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驻所研究期间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2-07-28

作者简介:王晓升(1962—),男,江苏射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分析这个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它与‘统治’相反,另一方面‘hegemonic’有时又与‘集团’或者‘经济集团’的意思相反,葛兰西用它来指称某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一个给定的群体不再拘泥于它在集团中的位置并保护其经济利益而是要超出这一点并渴望获得在政治或者社会领域中的领导地位。那些非领导团体或者阶级就被他称为‘附属的’、‘从属的’的阶级,或者有时称为‘工具性’的阶级。”^{[1]14}葛兰西明确地把“hegemony”与“统治”对立起来。统治就是一些人运用政治或者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其他人服从自己的指挥。而“hegemony”是指一种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影响力,一些人运用自己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影响力而使其他人接受其指导。因此,“hegemony”与“direction”(指导)和“leading”(引导)的意思接近。但是,它们之间又不完全相同。“hegemony”还包含了“结合”、“连接”的意思。要想准确地把握“hegemony”就必须把它与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与他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理论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仅简略地联系这几方面的理论来深入说明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

对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进行了仔细的概念分析。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都有一定的知识,都能够进行某种专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从他们能够履行某种经济功能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来说的。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外而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被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规模都有其特殊的含义。所谓传统知识分子就是指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与以往的或者现存的阶级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或者说,他们就是来源于这些阶级。但是他们却刻意要掩盖这种阶级关系。用葛兰西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通过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而与历史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自主的并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2]17}。而“有机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可能来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不同行业,但是他们不受自己工作的行业的限制,甚至会超出自己的行业而思考和组织特定的社会阶级,特别是在社会中占基础地位的阶级(a fundamental class)。这些有机的知识分子能够把其他社会阶级组织起来,能够和其他社会阶级进行有机的结合,能够不断地扩大自己。比

如,企业主不仅要技术专家或者是经济上的专家,而且也精于组织人员,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以及客户的信任等。因此,就是说,虽然不是所有的企业主都有能力组织国家,至少其中的某些精英会组织国家,创造出适合他们自己阶级利益的社会条件。他们既可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与新阶级的产生和扩大有关的^{[1]16}。对于葛兰西来说,有机知识分子具有凝聚大众的社会功能,它们可以掌握领导权。他认为,一个社会团体要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上吸收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他认为,一个团体越是能够扩大有机知识分子的规模,就越是能够有效地吸收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1]10}。

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hegemony”还与他对于“市民社会”(可以译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理解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不像社会的基础团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那样与生产过程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与生产过程的联系是经过中介的。在他看来,这个中介就是“上层建筑”。葛兰西所说的上层建筑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一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公共文化机构和公民自治组织。知识分子就是这些“上层建筑”中的职员。他们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机构而与生产过程发生间接联系的。上层建筑中的这些职员与生产过程、与社会的基础阶级之间的联系是一种间接联系,这种联系有紧密程度的区分。葛兰西把这种联系的程度称为“有机的品质”^{[1]12},在他看来,这种“有机的品质”是可以度量的,是可以被划分为等级的。然而遗憾的是,葛兰西本人没有明确地指出究竟是“市民社会”中的职员,还是“国家”中的职员与社会基础团体的联系更加紧密。实际上,按照葛兰西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任何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都可以成为有机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哲学家”,只要他们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出生、职业而能够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工厂中的工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政府中的职员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之间在“有机的品质”上的差别不是原则性的。

尽管葛兰西没有明确地说明不同人之间的“有机的品质”有什么差别,但是葛兰西还是把“有机的品质”与“hegemony”的含义联系起来,甚至把它们看做是一致的东西。按照葛兰西的说法,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新阶级出现的过程中而产生的。比如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有机的知识分子”,而在社会主义

制度产生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有机的知识分子不是掌握政权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不可能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统治”,或者说用暴力进行统治。他们会领导或者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这个引导工作就是“hegemony”。

葛兰西是从功能上把“国家”(他又称之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的。市民社会的功能是“hegemony”,这是主导团体或者阶级(dominant groups)施加于整个社会的;而国家的功能是“直接统治”或者命令,这是通过政府机关或者“司法部门”所施加的^{[1]12}。葛兰西对这两者之间还进行了严格的区别。主导团体对整个社会的指导和引导是通过威望而得到整个社会的自发“赞同”^{[1]12}。而国家的直接统治就不同了。他说“国家机器运用强制力量而‘合法地’把这些规范强加于这些团体,而这些团体既没有积极地也没有消极地‘承认’它。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个机器恰恰就是在预见到命令或者指示发生危机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发的承认没有出现的时候而建构起来的。”^{[1]12}

当葛兰西把“hegemony”与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控制对立起来的时候,这个词就与“民主”密切地联系起来。在葛兰西那里这种民主就是要通过知识、道德上的威望而与其他社会团体相结合。通过这种团结而形成的国家就是伦理国家^{[1]352}。这种所谓的伦理国家实际上就是要达到国家的消亡。国家转变为通过道德和知识联合起来的市民社会,这是市民社会的极大扩张。他说,“只有当社会团体终结了国家并把它自己的目的作为应该达到的目标,它才能建立伦理国家——即它将终结被统治者的内部分裂等,并创造出—个技术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有机体。”^{[1]259}在这里,葛兰西也是把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作为实现伦理国家的主要途径。在他看来,只有不断扩大不同社会团体在道德和知识上的联系和结合,或者说只有通过“hegemony”,国家的暴力统治才会逐步消失。对于葛兰西来说,这种消除了暴力统治的国家,即通过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结合和组织自治,民主制度就得到了实现,国家就会消亡。拉克劳和墨菲也因此把葛兰西的“hegemony”看做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

三、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hegemony”的评述

拉克劳和墨菲吸收了葛兰西的上述思想。他们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吸收了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的社会立场、价值观和他的职业活动无关。虽然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只有那些超越了自己的职业活动、超出了职业活动的阶级立场,知识分子才是有机知识分子,他才能和其他人结合起来,他才能够发挥社会影响力并团结其他社会力量。拉克劳和墨菲接受了葛兰西这个思想,并对它加以改造。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既然从事职业活动的人能够超出职业活动的范围、超出职业活动所规定的立场而与其他人联合起来,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种社会联合中人没有固定的身份。或者说,人不是始终以某个阶级身份出现的。人不是在生产结构中被规定了的主体,他只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系列“主体位置(或立场)”(subject positions)。如果一个人能够跨越许多不同的“主体位置”,那么他就能和其他人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和道德的领袖们就可以构成一种“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1]364}。这种集体意志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而把不同的人粘合起来(拉克劳和墨菲称为“链接”),从而形成一个“历史性组合体”(historical bloc)。那么,一个阶级怎样才能获得领导地位,把其他人结合起来呢?葛兰西更重视的是意识形态策略。在葛兰西看来,集体意志的形成依赖于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葛兰西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复合体所受到的批评,即新历史阶段的首要代表者对它所进行的批评……”^{[1]159}拉克劳和墨菲从葛兰西的这个论述中得到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他们认为,葛兰西在这里的伟大之处就是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复合体”的思想。既然意识形态是复合体,那么意识形态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思想的要素的集合。在这里,意识形态不能和“思想体系”或者社会行动者的“错误意识”等同起来。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是有机的和联系的总体,是社会中的黏合剂。它们“体现在制度和机器中,并且围绕着一系列链接原则而构成历史性组合体(historical bloc)。”^{[1]67}既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复合体是与其他社会要素结合在一起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就被摧毁了,政治和经济的区分失去了意义,思想和物质的区分也不存在了。社会就是各个要素的结合。社会运动中的领导权就是在社会结合中形成的。在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要取得领导权就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黏合剂而与其他社会要素结合起来。领导权的关键就是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上的结合。

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这个思想——这个被他们加以后结构主义诠释了的思想——大加赞赏。他们认为,葛兰西在这个问题上超越了列宁。这是因为,在列宁那里只有一种取代(displace-

ment) 的观念,即工人阶级可以取代资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这种取代的观念中,虽然工人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它却没有明确地超越自己的阶级立场,它仍然是工人阶级。虽然工人阶级也要和资产阶级联合,但是这种联合却是被掩盖起来了。而葛兰西却完全超出了这种取代观,工人阶级不再受到自己的阶级立场的限制而与其他人进行社会联合。在葛兰西那里,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不是固定的,它能够改变自己的立场而与其他社会团体合作而形成“集体意志”。对于这一点,拉克劳和墨菲非常欣赏,他们感到自己找到了理论上的同路人。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一个社会团体或者某个左翼运动要能够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就必须放弃团体的既定身份,就必须放弃阶级立场。或者说,工人阶级如果要在现代民主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就必须放弃阶级身份,放弃阶级立场而与其他人结合起来。对于葛兰西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身份,一个人就不能成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他就不能取得领导权。可以说,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中包含了这个意思。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他的这种思想把“链接”的观念突出起来:在这里,历史运动的主体不是由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规定的,而是集体意志形成的结果,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活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历史中的每个要素的意义是由链接过程来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历史的运动中,社会群体没有确定的立场或者确定的身份,它们的立场或者身份是在链接过程形成的。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葛兰西那里,政治主体不再是阶级,而是集体意志?是不是意味着,各种意识形态的要素与阶级无关呢?显然不是,我们知道,葛兰西是在监狱中写作的,为了回避法西斯主义的检查,他在写作中不使用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而更多地使用“团体”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就认为工人阶级完全放弃了阶级立场、放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比如,我们在前文引述了他的这样的说法“主导团体由于其在生产世界中的功能和地位而享有威望(并因此得到信任)这种赞同就是由威望而‘历史地’引发的。”这里的主导团体就是指工人阶级,这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才能获得地位和威望。显然,如果主导团体(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功能和地位没有为它获得威望和地位,它就无法在整个社会运动中获得领导地位。对于这一点,拉克劳和墨菲似乎也很清楚。不过,他们认为,这是葛兰西思想中

的缺陷,是他不够彻底的地方。他们说,由于对于工人阶级的地位模糊不清,葛兰西的思想最后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立场^{[2]70}。在他们看来,葛兰西没有能够最终摆脱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的思想。这是因为,葛兰西在回答工人阶级为什么会有威望的问题上认为,这个阶级之所以有威望,是因为它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葛兰西看来,在社会要素的链接过程的,虽然社会要素的身份会发生变化,但是葛兰西还是承认社会中存在着“基础阶级”。对于葛兰西来说,社会中的基础阶级会取得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是由基础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葛兰西那里,“阶级领导权不是斗争的实际结果,而是有其最终的存在论基础的”^{[2]49}。这个最终的存在论基础就是一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威望与它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没有关系,而与它是否能够结合更多的人有关。如果它把更多的人结合起来了,那么它就获得了领导地位。

四、“hegemony”的后现代改造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只有他们自己才最终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而使“hegemony”这个概念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这就是一个后结构主义的“hegemony”。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第二版序言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把自己说成是代表全体人的利益,这个阶级才能取得领导地位。虽然拉克劳和墨菲不承认有什么固定身份的阶级,但是他们也强调,一个团体要取得领导地位就必须具有普遍性,一个特殊的力量要能够代表社会的总体。而一个特殊力量要能够代表总体就必须有一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hegemony”。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是政治分析中的中心概念,其含义是“政治链接”。这就是说,在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利益,也不存在永远的斗争对象。这种链接是在面对特殊任务的时候而产生的临时组合。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力量要能够在这个特殊的任务中占据领导权就必须能够代表总体。它能够代表总体不是因为它与总体有一致的利益,相反,它与这个总体没有任何可以通约的东西(radically incommensurable)。由此,对于他们来说,特殊的東西代表总体并不是因为一致利益而具有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利益意义上的普遍性而是“hegemonic universality”(接合起

来的普遍性)。拉克劳和墨菲承认,他们所说的这种普遍性不能按照传统的一致性、同一性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比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还要松散。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纲领中”,这种普遍性是不可能的。而要使这种普遍性成为可能,我们就必须把社会想象为一个“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

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话语就是社会,社会就是话语(这里的话语不是指空洞的言语,而是与社会行动结合在一起的)。按照他们对于话语的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不是像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由差异符号所规定的,而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它们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是确定的,同时又是不确定的。比如,我们说,“张三是个医生”,我们后面又接着说,“是给狗看病的医生”。虽然在第一个句子里,“医生”的意思是确定的,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不断地修改前面的句子。或许后面还有许多无限的句子。从这个意思上说,任何句子的意思都不是确定的。话语要不断地说(articulate)出来,意思才不断地明晰,但是不可能完全确定。同样,各种社会要素也要结合(articulate)或者链接起来才有意义。比如,一个人在和其他人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获得了一种身份,但如果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结合中,他的身份又会变化。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的身份完全是固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缝合”起来的社会。相反,如果社会要素没有任何的结合,那么人就没有任何身份,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漂浮的能指”。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社会不可能完全缝合起来,也不可能没有任何链接。社会要素要被链接起来就必须有链接的网络。在这个链接的网络中存在着关节点(nodal point),后结构主义者拉康称之为“主导能指”(master-signifier)。按照这样一种“主导能指”的观念,一种特殊的要素在话语领域中执行一种“普遍”建构的功能^{[2]11}。所谓“主导能指”就是指一些有权威功能的空洞符号,这些空洞的符号能够把完全不同的、没有任何通约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它发挥了一个链接的功能。不同的社会要素在这里被链接起来了。而就是在这种链接中,不同的符号获得了意义,或者说,不同的社会要素(人)获得了身份。“主导能指”的这种缝合功能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特殊要素执行了普遍建构的功能。在这里,特殊的東西代表了普遍性。在建构过程中,这些社会要素的身份不是预先确定的。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hegemony”的意思就可以用“主导能指”的缝合功能来确定,即主导能指把人结合起来,并使人获得了一个暂时的身份。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拉克劳和墨菲反对所谓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区分。对于他们来说,一切社会领域都是政治领域,即使在生产领域中也存在着政治斗争。或者说,他们把福柯的微观权力的观念用来进行政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活动是不受到经济要素的制约的,不是由经济要素所决定的。参与政治斗争的人并不都是从自己在生产中的地位出发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在政治斗争中,人们的政治立场或者意识形态观念(subject positions)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社会要素的结合中被改变的。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葛兰西虽然承认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身份是由链接活动所构成的,但是他却错误地承认了一个社会的基础阶级。这个阶级的身份已经预先由它在生产中的地位所确定,而它的政治立场似乎也在生产中被预先规定了。拉克劳和墨菲把人在政治的链接活动中所获得的主体性称为“hegemonic subjectivity”(通过领导权的活动所建构起来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从一定意义上也是非主体性。在这里,所有的人如同漂浮的能指,没有所指,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如果他获得了规定性,或者说成为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有了某种阶级身份,形成了某种观念,那么这是政治链接活动的结果。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看法,本来现代社会中没有所谓工人阶级,但是如果左派通过某种政治上的链接活动,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宣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而把不同的人群结合在一起,那么“工人阶级”就在这种链接活动中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所形成的这种联系被称为“hegemonic link”。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看法,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特殊的个体,都是社会中的一个要素(elements),只是在社会的链接活动中他们被结合起来了。在这种结合中,这些个人就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环节(moment)。

那么在这种链接中究竟什么人或者什么社会要素能够获得领导权呢?能够获得普遍性的人就获得领导权。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中的这些人都是千差万别,都是特殊的个体,这些人怎么可能链接起来呢?在这里,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他们的所谓等同原则。社会中有许多特殊的个人,但是这些许多特殊的个人会发生各种冲突。正是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社会中的人才没有固定的身份。或者说,冲突中的人总是要不断地颠覆既定的秩序,颠覆现有的社会身份。正是在这些冲突中,一些人通过等同逻辑而联系起来,或者说,他们在颠覆某种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一致性,即完全不同的个人在颠覆某种社会秩序方面一致起来。那么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如何领导这些临时联合起来的

人,或者说,他(它)如何取得普遍性呢?他(或者它)必须是分裂的。他们说“什么是代表的手段?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只有那躯体分裂了的特殊性,因为如果它仍然保持它自身的特殊性,那么它就要在代表普遍性——那个超越它自身的普遍性——中改变它自身。”^{[2]13}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特殊性要能够代表普遍性,就必须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要放弃这种特殊性而与其他社会要素等同起来。它是保持了特殊性的空洞能指(有特殊意义的空洞符号,比如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和其他许多特殊的东西等同起来。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个人,那么他没有立场,没有主见,一会儿和某些人一致起来,一会儿又和其他人一致起来。他必须左右逢源,和许多个人或者组织都粘得上。拉克劳和墨菲承认,这种普遍性是受到“玷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有两个特点:(1)它存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可化解的紧张关系中;(2)这种链接起来的普遍性(hegemonic universality)不具有恒久的功能,而是相反,可以被逆转的。”^{[2]13}如果一个群体能够用空洞的思想和口号把许多不同的、特殊的个人或者群体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取得了领导权,或者说,它就获得了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不是真的具有普遍性,而是与各种特殊性保持紧张关系的普遍性,其他特殊性可能随时取代这种普遍性。它的领导权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被颠覆的。“hegemony”就是没有身份的人群之间的结合,就是人们被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洞观念而黏合起来的。在这里,无论是个人还是思想观念都是空洞的能指,没有具体规定性。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一个人越是没有立场、越是没有思想就越是能够取得领导权。

五、结束语

无论对列宁来说还是对葛兰西、拉克劳、墨菲来说,“hegemony”,即一个团体不受到自己的经济地位或者社会地位的局限而参与民主革命的运动,都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策略。既然它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策略,那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制定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列宁到拉克劳、墨菲,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都有合理性。因而,拉克劳和墨菲简单地否定列宁和葛兰西的社会主义运动策略是不适当的。列宁根据落后俄国的特殊情况,强调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强调党的灌输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俄国革命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中,列宁的领导权策略后来变成了“威权”统治,这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但是,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威权统治的根源归结到“经济决定论”。在他们看来,一个阶级在生产中具有决定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在政治运动中也有领导地位。对他们来说,列宁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如果一个阶级在生产中占据了领导地位,那么它在政治革命中也占领导地位。列宁的思想就是坚持了僵化的经济决定论。

葛兰西根据意大利的复杂现实,根据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统治的现实,提出了领导权的理论。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他提倡各社会阶层的联合,强调各社会阶层不要僵化地局限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应与其他社会各阶层结合起来。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阶级利益、放弃社会身份而建立全民族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葛兰西所提出的“集体意志”、“历史性结合体”就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但是,拉克劳和墨菲却按照他们的后结构主义思路而对葛兰西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解。在他们那里,这种“集体意志”、“历史性结合体”变成了“链接”的代名词。葛兰西为了对付监狱的检查而采用的一些模糊的、隐喻的概念,比如“社会中占基础地位的阶级”等,这也被他们解释为一个社会团体失去了固定的阶级身份。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葛兰西对于基础地位的阶级的承认,也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无原则的退让。如果按这样的思路,那么拉克劳和墨菲似乎也不彻底。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拉克劳和墨菲从人和人之间的微观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他们侧重于从人和人之间的微观关系中把握社会斗争的新特点。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多元化和社会分裂的特点。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论述。我们试图讨论他们在理论上所存在的缺陷。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强调普遍性就是特殊性之间的链接。既然这是特殊性之间的链接,那么这种特殊性从何而来呢?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特殊性,有自己的特殊职业、特殊社会关系、特殊的爱好、特殊的价值观。这些特殊性都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只有存在着这些特殊性,特殊性之间的链接才有可能。如果他们都没有特殊性,那么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能够无差别地代表其他任何一个了,从而代表总体了。既然拉克劳和墨菲承认了特殊性,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人的相对固定的身份或者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但是拉克劳和墨菲的“hegemony”在承认这

种特殊性的同时又试图淡化处理这种特殊性。对于他来说,一个人只有摆脱这种特殊性才能和他人结合。工人就应该超出工人阶级的身份而与其他人结合。在这种结合中工人应该放弃工人的身份。应该承认,一个人在与其他人结合的时候,他的立场或许会发生变化,他的身份在政治运动中会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工人的身份。这只是表明,他不以工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或者不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不意味着他能够放弃工人的社会身份。如果不存在社会身份了,人们之间就不会出现差异性的紧张关系。虽然人们都有社会身份,但是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不同身份的人们可以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在这种政治立场上他们结合起来了。实际上,拉克劳和墨菲所强调的是人们的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人是工人,他在政治立场上一定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性和人的社会身份的不稳定性混淆起来。在一定社会中,人的社会身份是相对稳定的。拉克劳和墨菲根据人们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性而否定他们社会身份的相对稳定性。他们所提出的那个“subject positions”的概念恰恰就是要把个人身份和政治立场混同起来。

于是,在他们那里,人都成为“漂浮的能指”,没有确定的身份,没有确定的政治立场。他在一种情况下和某些人结合在一起,获得了一个暂时的身份;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与其他人结合在一起而获得了另一种身份,采取了另一种政治立场。应该说,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人确是如此。但是,这样一种没有确定身份、没有确定立场的人,也就是没有主体性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主体身份的人。而这样的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人恐怕连自己都无法领导自己,又怎么可能成为“主导能指”而领导别人呢?如果所有这些都试图成为“主导能指”,都想获得“普遍性”,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会发生斗争呢?这种微观的权力斗争到处都存在。拉克劳和墨菲究竟用什么方法说服这些人,让他们放弃自己的立场而与其他人结合起来呢?在这些问题上,拉克劳和墨菲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具体的、可操作的策略。拉克劳和墨菲的策略似乎是这样的,即如果一些人能够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而这些空洞的口号能够把其他人的不同思想都涵盖起来,那么这种空洞的口号就能够吸引人,就能把这些不同的人临时组合起来。可是虽然这些人可以被临时组合起来,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达到一定的目标,这又会如何呢?如果他们对空洞口号的理解不同而发生冲突又该如何呢?或许在拉克劳和

墨菲那里,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算不了什么。我们认为,拉克劳和墨菲在这里过分强调了人和人之间在思想上的冲突和矛盾,而忽视了合理思想的重要性。思想上的领导权不能靠空洞的概念来综合不同的观念而实现,恰恰相反,它要靠人们之间的辩论和说服斗争。只有当一个理论说服另一种理论,它在理论上的领导权才是可能的。而拉克劳和墨菲恰恰否定了这种理论上说服的可能性。在这里,拉克劳和墨菲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述行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在“叙述”上,他们写了这一本书,讲了很多道理,但行动上他们又认为任何理论都没有说服力。在他们看来,一种道理说服另一种道理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在这里说道理呢?

尽管拉克劳和墨菲没有提供任何可操作的策略,但他们还是确信,他们所提出这种社会主义策略对于实现社会平等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就是要把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并使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都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把各种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定的压力团体。一个社会群体如果越是能够把不同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那么就越是具有社会影响力。但是,他们所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力都能够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吗?如果这些人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乃至伤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能够保证社会平等吗?拉克劳和墨菲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了他们的这种担忧。他们认为,这是左翼运动和自由主义之间斗争的焦点。但是,左翼运动内部是不是也会有权力斗争和内部斗争呢?如果拉克劳和墨菲把福柯的思想坚持到底,承认“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斗争”,那么社会的平等就绝不可能靠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来实现。他们恰恰需要分析这些权力赖以产生的基础——个人的能力、财富、地位等。个人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究竟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才是正当的?这才是左翼政治理论和自由主义之间斗争的焦点。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为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应该让位于为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而进行合理论证的理论斗争。

参考文献:

- [1]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2] LACLAU,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1.

[责任编辑:高云涌,常绍荣]

·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



张屹山 1949年生，吉林农安人，曾任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被评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数量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吉林省政府参事。主要从事数量经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经济管理类教学中实现文理渗透、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匹配，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4 篇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 篇获人民日报优秀内参二等奖，1 篇获国家统计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公开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其中 1 部获教育部首届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经济研究的权力范式导论》（2008 年第 1 期）、《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探索》（2012 年第 3 期）。

金东日 1959 年生，吉林和龙人，韩国高丽大学公共行政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组织理论、公共政策、东亚公共行政比较研究。出版《行政与现代化：以中韩两国为例》专著 1 部、《政策学的主要理论》等译著 2 部、《现代组织理论与管理》等教材类著作 4 部，发表《中国政府过程的体制症结探析：以政策过程为中心》、《质疑“学术权力”：兼论和谐社会的另一层含义》、《论政府责任的合理性基础：以政策过程为中心》、《论体制及其先进性》等论文数 10 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加入 WTO 的政治意义》（2002 年第 6 期）、《“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2008 年第 1 期）、《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2012 年第 10 期）。



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加入 WTO 的政治意义》（2002 年第 6 期）、《“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2008 年第 1 期）、《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2012 年第 10 期）。



王晓升 1962 年生，江苏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 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曾经先后在英国利兹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作访问学者。出版了《语言与认识》、《现代化发展和价值》、《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概述》、《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与郭世平合作）、《价值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第一作者）、《为个性自由而斗争》、《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等学术著作，翻译了《价值判断》（与马俊峰等合作）、《分裂的社会世界》等著作；发表论文 150 余篇。主要从事社会历史观的研究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作为关系的社会概念——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思路》（2010 年第 4 期）、《个人活动抑或社会结构？——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2011 年第 4 期）、《评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hegemony”的改造》（2012 年第 10 期）。

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作为关系的社会概念——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思路》（2010 年第 4 期）、《个人活动抑或社会结构？——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2011 年第 4 期）、《评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hegemony”的改造》（2012 年第 10 期）。